

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,这是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。设于京师开封的国子监,是政府系统中的最高学府,它包括两个学院,一是“国子监”,系贵族学院,七品官职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;一是“太学”,则八品以下低级官员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入学。另外,社会上还有众多书院,规模的宏大,有时超过国子监,其中最享盛誉的是湖南衡州(今衡阳市)的石鼓书院,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,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,湖南潭州(今长沙)的岳麓书院和河南应天(今商丘)的应天书院等5所。

同学校教育相配合的是图书。宋朝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,它包括“昭文馆”、“集贤院”、“史馆”和“密阁”等四馆,其图书最多时达73000多卷。崇文院最大的贡献是它编撰了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和《册府元龟》等四部巨大类书,这是对我国文化史的一大贡献。从官府到民间,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批有名的藏书家,如司马光、叶梦得、赵明诚、李清照、陆游、陈振孙、郑樵、欧阳修、岳珂、晁公武等。他们不但收集图书,有的还私家校刻图书,且多有著作传世,使得图书印刷更盛极一时。

宋代科举名额的扩大,使大量寒门之士进身仕途,使皇帝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士大夫的代表和化身。知识分子从而亦具有十分优越的社会地位。赵宋统治者重文轻武的国策导致了冗官冗费、积贫积弱的不利局面,但也造成了一支比前代数量远为众多,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文化队伍。文化普及有赖于图书普及,图书普及有赖于进步的印刷术。由广大中小地主组成的庞大的士大夫阶层是图书的主要消费者,他们对图书有着较高的审美需求。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,雕版印刷的工艺技巧得到了高度发展,大量精美的图书由此产生并广为流布。苏轼曾概括道:“近岁,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,日传万纸,学者之于书,多且易致如此。”^①

知识阶层将图书的形式美提高到与内容等同的高度,促使了图书到文化“形式”与“内

容”的统一。雕版文籍的制作、鉴赏因此成为文人的雅事,成为士大夫文化生活的一部分。“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”,^②“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板”^③。文人们刻书可以支用公款,后人谓之“公使库本”^④。洪迈因刊行《万首唐人绝句》还受到皇帝赐茶、香、金器的厚奖^⑤。

后人曾这样赞颂宋版图书:“若果南北宋刻本,纸质罗纹不同。字画刻手古劲而雅,墨气香淡,纸色苍润,展卷便有惊人之处。所谓墨香纸润,秀雅古劲,宋刻之妙尽之矣”^⑥。这种讲究淡雅、神韵的追求,正是宋代知识分子审美情趣的反映。宋人山水画的“神、趣、韵、味”,诗词格调的理趣、清新与飘逸,宋瓷色泽的净润而高雅等等,都表现出与宋版书同风一格的精神,真可谓之时代风貌。因此,可以说雕版印刷(亦即宋版书)黄金时代的出现是庶族地主文化的产物。

两宋以后这个阶层虽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亡,但其革命性和进取精神却已经逐渐削弱。随着庶族地主阶层的没落,雕版印刷的质量逐渐由精美转向粗滥,校仇也日趋疏陋。郎瑛在《七修类稿》曾云:“世重宋版诗文以其字不差谬,今刻不特谬而遗落多矣。”正说明了这一变化。

二

雕版印刷在宋代走上顶峰,有其特殊的经济基础—宋代最为突出的是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。著名的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都城纪胜》、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、《梦粱录》、《武林旧事》等都有详细的记载。

汴京是北宋最大的城市,“比汉唐京邑,民庶十倍”^⑦,号称“八方争凑,万国咸通”^⑧、“城内人口已逾百万”^⑨,而大批官员和禁军尚未计算在内。从著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即可看到城内的繁荣景象,“彩楼相对,绣旗相招,掩翳天日”,“举目则皆青楼画阁,绣户珠帘,雕车兢驻于天街,宝马争驰于御路,金翠耀目,罗绮飘香”^⑩。而号称“东南形胜,江湖都会”的杭州,也是“烟柳画桥,风帘翠幕”,“市列珠玑,